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语言哲学的后现代趋向

殷杰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关键词 后现代性;语言哲学;后现代语言哲学

摘要 该文通过简要叙述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和研究近况,揭示了在后现代主义运动影响下,语言哲学发生了朝向后现代性生长的趋向,而指称理论、真理理论和心理意向论研究范式的变换,生动具体地展示了这种演变的特征和意义,对于总结语言哲学在20世纪发展的路径和把握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和启迪意义。

中图分类号 B7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0)03-0010-06

从20世纪人类文化的进步中透视语言哲学的理论发展,我们会自然地发现,一方面,在历史和现实所交织的框架中,语言哲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各种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并深嵌着后现代性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语言哲学也以它独特的运动性质展示出了哲学理性的意义,并探索着朝向21世纪的出路。因此,我们赋予语言哲学运动以后现代性趋向,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它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一 后现代语言哲学的现存性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作为20世纪人类哲学思维的第一场深刻革命,对传统哲学理性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并对后世哲学的发展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一般特征,研究语言同实在和思维的关系,研究各种表达式的指称和意义,以及真理和必然性、意向性和言语行为、理解和解释等。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其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已大大超出了它本来的含义,也不止于哲学领域而广泛地涵盖于20世纪西方

人文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批判等各个领域。毫无疑问,它对人类思维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普遍的和深刻的。但从哲学的意义上讲,“语言学转向”最直接的后果在于,影响哲学发展近半个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和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运动的开展。在弗雷格(G. Frege)、石里克(M. Schlick)的倡导和罗素(B. Russell)、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等人的发展下,一方面,他们把哲学的全部问题归结为语言的误用和滥用;另一方面,现代逻辑的产生又为他们提供了治好哲学“语言病”的最好工具。因此,在他们看来,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成为哲学唯一有前途的出路。这种对待语言的态度和求解哲学问题的途径,在英美哲学家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并成为他们所主要坚持和从事的研究课题,因此,哲学史上将之称为分析哲学。其主流为英美语言哲学。

总体上讲,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发展途中,同时有一支与英美语言哲学截然不同的关注语言的研究传统,这就是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其发展大致沿着三条线索^[1]:一是从

【收稿日期】 2000-03-01

【作者简介】 殷杰(1974-),男,山西汾阳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二是从古典释义学、释义学理论到哲学释义学和批判释义学；三是从普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尽管英美语言哲学和大陆语言哲学都普遍注重研究符号和表达式、语言和思维、语言和实在、意义和真理等问题，但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从另一个角度关注语言问题，与以分析哲学为主流的英美语言哲学更多涉及数理逻辑，并侧重于研究专名、通名、摹状词以及语句的指称问题、意义检验标准问题、言语行为问题、必然性和可能世界问题等不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注意汲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侧重于研究语言的本质和功能问题，意向和意向性问题，语言的结构问题，语言、言语和文字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以及理解和解释问题等。长期以来，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这两大流派沿着各自的研究传统和路线，在各自的课题领域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也客观地加剧了欧洲大陆与英美哲学的现代分裂，并导致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绝对的、僵化的界限和逐渐远离的分裂。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场席卷整个文化领域的思潮影响了语言哲学的发展，这就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运动。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当这种“后现代性”效应渗入语言哲学的研究中时，后现代语言哲学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作为现时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思潮之后的语言哲学受到了国内学人的普遍关注，从最初单纯的西文著作的引进和介绍发展到就语言哲学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涂纪亮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三联书店，1994)以及徐友渔、周国平等的《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在众多学者苦心孤诣、不断探索下，国人对语言哲学的研究逐步摆脱了亦步亦趋于西方之后的尴尬局面，并且因注重理论的演绎过程而深入于问题的实质。

客观地讲，山西大学的郭贵春教授在“后现代性与科学哲学的选择”这一课题领域内达到了国内甚至国际的领先水平。对科学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论者颇多，但是，真正将科学哲学的发展定位于后现代主义这一背景下进行元理论的探索，郭贵春教授无疑是国内较早的倡导者。他创造性并坚定地把20世纪科学哲学的理论演变构建为在“转向”中的运动，即在“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和“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三大转向的影响下进行的生成和发展。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科学哲学思潮演化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提供了最清晰、最本质的脉络。^[2]更为重要的是，在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演变特征之后，郭贵春教授更具创造性地把“语境”(context)作为研究的视角审视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令人信服地将语境构建为科学哲学理论未来发展的基点和生长点。语境这一在后现代状况下达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相融合的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为整个语言哲学甚至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经济的”基础，可看做是在用“奥卡姆剃刀”削去一切不必要因素的最直接的阐释基底，而不需要在形式上再做抽象的语言哲学的本体论还原。^[3]并且，在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他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研究方面已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版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知识出版社，1995)和《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等专著，开拓性地把国内科学哲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为我们对语言哲学进行后现代性的分析提供了先在的理论背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是在这一前提背景下，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郭贵春教授又把目光转向语言哲学领域。本文作为这一思想体系构建的一部分，正是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语境论观念在语言哲学领域内的反映。

因此，我们之所以提出后现代语言哲学并认为它具有现存性，一方面，这是在整体考察和研究哲学理论发展并做出成功的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这也是语言哲学内在发展的必然。具体体现为：

首先，语言哲学自身理论的矛盾和缺陷促使它向后现代主义“开放”。以英美语言哲学为主流的分析哲学，出于构造精确理想语言的需要，把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把主观等同于虚构，把客观等同于真理，等同于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客体的本来面貌。这样，就要求思想、命题或理论应与其所阐释的对象具有相同的结构，或者说在构成要素上要与对象的要

素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强调语言符号与外在对象具有严格的指称关系。这一思维的最大后果在于导致了对应论的本质论、符合论的真理论以及反映论的认识论,成为语言哲学发展的桎梏。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为标志的日常语言学派,一反理想语言的传统,强调认识主体在认识系统中的作用。因为在认识系统中,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认识是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既有整体性,又有多维性,既有现实性,也有历史性与条件性。心灵对有关对象的知觉与反映,要受到主体的成见、欲望和过去的知识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它除了反映对象的有关特征之外,还要反映主体的有关心理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否认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具有语义的单义性和指称性,进而否认语言符号表征客观真理的可能性,而强调语义的内在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从而从语言哲学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下消除了存在于传统语言哲学中的这一僵化的、机械形而上学思维。

其次,后现代主义运动所呈现出的“后现代性”特征客观上促进了语言哲学的后现代发展。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它所彪炳的后现代性席卷了西方哲学的所有领域。^[4]所以,后现代语言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语言哲学领域中的渗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后现代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J. Austin)关于意义的关键在于命题的思想,构成了语言多样使用和处理世界复杂关系的具有后现代特性的评价范式。在这里,对语言多样使用或语用的特殊语境的强调,正是基于语言整体本质或整体结构的要求而实现的,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趋向;另一方面,诉诸于一种行为主义的以消解意义的表达论和表证论之间的对立的绝对性,更是给出了一种后现代性能够生长的基底。

最后,语言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反映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时代要求。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截然对立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后现代视角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产物,语言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无疑为寻求新的哲学研究的基点提供了可能的合理途径。长期以来,代表了不同哲学主题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处于对抗性的哲学情绪状态之中,如何在新的研

究基点上消解对抗,增进对话,便成为理论探索的焦点话题。从这个意义讲,透过后现代哲学文化的视点,通过语言这一共同关心的话题,为两大传统寻求到了一种能够在本体论性、认识论性和方法论性上达成一致的新的突破点和关节点。事实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英美语言哲学和大陆语言哲学已正在逐步合流,英美分析哲学家开始注意研究意向性理论和解释理论,欧洲大陆哲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指称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展示了后现代主义运动对语言哲学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后现代哲学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趋同性。

二 后现代语言哲学的特征

正是在坚持后现代语言哲学具有现存性这种观念的基础上,我们通过三个专题性的论述,或者说语言哲学的三个核心理论,即指称理论、真理论和意向理论,来进一步围绕“后现代性与语言哲学的选择”这一主题进行论述,一方面,通过语言哲学的三个基本的、具体的理论在后现代状况中发生的演变,来展示语言哲学后现代趋向的具体特征和发展走向;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具体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共同构成了语言哲学的后现代趋向,显示了理论进展的整体性、现存性和必然性。

1. 指称理论的后现代演变

从传统的意义上讲,指称理论所探讨的是关于语言的指称语词,也即关于名称、谓词以及它们指称或应用的对象和原因的理论。其重要性就在于它直接地揭示了语言和实在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对应的或映射的关系。随着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中叶的“后现代”思潮,重新凸现了语言理论并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划出了明确的思维界限,而探讨语言和实在关系的指称理论也因整个背景视角的转变必然地发生了某种时代性的演变,其特征深刻地渗透着“后现代主义”精神所独具的风格、意义和历史印迹,展现出指称理论历史发展的“后现代性趋向”,显示了人类整体理论思维的变化。这一演变主要体现在:

(1)从传统语义学的解构到“后现代”语义学的设定

传统指称理论所追求的一一对应的“映射”式观念的错误在于其根基于主张只有具备确定性所指的语词才有意义的语言实在观。在抛弃绝对所指观念的基础上,“后现代”语义学把语言视为一种确定的

此部分的具体论述,详见郭贵春、殷杰《论指称理论的后现代演变》(《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58-65页)。

客观实在,一种不断进化的实在,从而开创了指称理论演变的基础。

(2) 从绝对的确定性到相对的非确定性

语词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而是在广阔的“语境”之中相对于整体世界图景的“不确定”,这一观念构成了指称理论后现代研究趋向的基本态度。

(3) 从心理观念的排斥到心理意向的重建

人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离开自然语言,而一旦进入自然语言,有关“心理实在”的问题就会重新回到议事日程上来。“语境”观念的提出无疑为意向性的重新凸现提供了合理的可能性。

(4) 从微观语义分析到整体语义构造

语义分析方法的这一观念转换,进一步为语言哲学的后现代研究提供了可使用的工具,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整体理论思维转变中的一个方面。

由以上分析可见,指称理论的发展演变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当然,对指称认识论发展演变的“后现代”关注,并不意味着仅囿于语言本身的狭隘圈子,而是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逐步整合的趋势下,从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方位进行的整体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指称理论的后现代演变及其所昭示的“后现代”特征,也只是这一研究中特定的“趋向性”或“态度”,它引导我们去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和把握,而不是去做任何教条式的断言。

2. 真理观念的后现代走向

真理问题在现代科学和人文背景之下,仍具有着新的意义。但随着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原有形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论争,开始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后现代走向。

历史地讲,在真理问题上,作为主流而又颇具影响的观点是“真理符合论”。在致力于澄清并使传统真理符合论精确化的道路上,塔尔斯基(A·Tarski)为真理概念寻求语义学基础所做的工作,无疑是最富创造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戴维森(D·Davidson)有效地借鉴了塔尔斯基的工作并进而将之运用于构建自然语言真理论。从而使得真理观念突破传统语义层面而走向了语用对话的广阔空间,促使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将语形、语义和

语用的因素内在地结合起的建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走向必然。其后现代性表现在:

(1) 语境成为本体论性的实在基底

语境展示了其作为人类认识基底的合理性,使人类可以在语境结构自身之中去建构任何语言的合理对话,去探索一切适当的真理论。

(2) 语境构成了公共实践的具体形式

人类信念的变动,真值的取舍,都是语境的再造或公共实践具体形式的变易,都是在公共实践具体的、多样化的关联之网内所进行的信念的重新编织。

(3) 语境成为展示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

在特定的语境中,心理意向在本质上构成了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也正是这种统一,内在地决定了语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定了真理的建构性和趋同性。

(4) 语境满足了整体论的方法论要求

语句真值的赋予和判定,在于它们处于与其它已被证明为真的语句的推理关系之中,即处于证明或正确判定它的整体语境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语境化”真理观作为语言哲学后现代演变的必然趋向,内在地显示了“语境”作为一种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因此,不是真理具有任何独立于语境的意义,而是只有在动态的语境中才能展示真理的存在。我们现实地关注的只能是“语境化”了的真理,那种绝对抽象的形而上学真理只能被“悬置”一旁。

当然,真理的“语境化”,只是真理发展的一种“趋向”。事实上,它既是整体语义论、语用对话论的历史继续、发展和开拓,更是从语言哲学角度探讨真理问题在后现代境况下的融合,内在地体现了后现代性趋向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应在“语境”的既非还原论也非扩展论的意义上,现实地展示出真理发展的未来走向。

3. 心理意向的后现代重建

由于“语言学转向”尤其是“解释学转向”的不可逆转,心理解释的意向重建成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后现代视野中全新的融合点和生长点。这不仅使得“心理学转向”成为自然而又必然的趋向,同时为科学实在论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界域和形式。

历史地讲,意向性问题属于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研究的范围,指有所意指的意识性

此部分的具体论述,详见郭贵春、殷杰《论真理观的后现代走向》(《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7期,第13-18页)。

此部分的具体论述,详见郭贵春、殷杰《论心理意向的后现代重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期,第5-10页)。

质。布伦坦诺(F. Brentano)开创了现代心智哲学意向性理论研究的传统。但是意识的更为确定的标志在于它的言说或使用语言的一种能力。因此,只有将意向性问题的研究奠基于命题态度并诉诸于主体的言语行为,意向性理论才会在语用的整合中生成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命题态度的这一实在特性,使得我们可以在后现代走向中,以自然化的“回归”为契机,以走向语用为基本目标,来实现意向性的自然化。而命题态度的选择和意向性的自然化这些背景论题一旦被解决,意向实在论的建构就成为必然的了。从后现代的视角上看,它不仅具有一般实在论的特点,而且是一种科学的意向实在论建构。其后现代性特征体现在:

(1) 意向实在论满足了科学心理认识的本体论需要

由于它不仅关注于主体态度的指向而且赋予其特定的意向值,从而就将内在心理意向要求或意向趋势与外在因果指称分析或方法融合起来,合理有效地为科学心理认识提供了实在性的基底。

(2) 意向实在论体现了人类文化解释的“语境趋同性”

诉诸于主体的命题态度、偶时意向、言语行为的心理意向实在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语用系统,它与文本的解读要求是一致的,反映了在人类文化的说明中,对科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和实践的语境的趋同性。

(3) 意向实在论提供了计算机模拟人脑理论的哲学基础

由于使用者赋予计算机的操作意向的存在,任何绝对中性的无意向的东西都被消解了。表面上完全形式化了的计算程序所体现出的是人类心理意向的深层展示,并且计算机的更新换代,显示出对人脑的更为逼真的模拟。

(4) 意向实在论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后现代走向

心理意向的后现代建构使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哲学传统在本体论性、认识论性和方法论性上逐渐趋于一致,展示了后现代哲学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趋同性。

当然,坚持一种科学的意向实在态度,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止境地夸大命题态度的价值取向或任意地赋予意向行为的真值条件,意向性只是在本体论性的意义上才具有实在的合法性。事实上,心理的意向性不仅创造了意义的可能性,而且限制了它的形

式。除了相关行为的意向性对象的结构之外,它需要求助于语境的、因果的因素,从而在整体的相互关联之中,给予真正的自然化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指称理论、真理理论和意向理论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所发生的理论变换的考察,目的在于能够由此窥视出语言哲学的一种整体的理论范式转换,从而引导我们在此基点和视角上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当然,在语言哲学的大厦中,对语言的探究涉及到意义理论、心身理论和存在理论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发展的趋向,由此显示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方法论的更新,以及理论演变的未来走向所带给人的深刻启迪和认识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

三 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走向

通过“指称理论”、“真理理论”和“意向理论”在后现代状况下所发生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后现代主义运动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语言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仍具有其独特的时代效应。从后现代性上分析语言哲学的未来发展,可以看出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可能的趋向:

其一,本体论性与整体性的结合。随着语言哲学后现代趋向的发展,为了彻底地清除基础主义,消解简单的反映论和还原论,必须从本体论上赋予指称、测量、经验、范式等最基本的概念以特有的语言实在,以使它们能够构成各种语义分析的基底,而不必在本体论的分析上导致形而上学的不断后退。另一方面,为了清除本质主义,解构绝对性,又存在着赋予具体的指称、测量、经验、范式等范畴以整体论性的必要性。由此,在一个较为恰当的基点上将本体论性和整体性结合起来,奠定整个语言哲学理论大厦的稳固的逻辑基点,既是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又是后现代语言哲学较有前途的可能出路之一。

其二,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并重。长期以来,反心理主义、反非理性的立场一直贯彻于整个分析哲学运动的始终。但随着语言哲学的后现代发展,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截然对立的情绪逐渐被消除了。强调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是非理性因素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科学真理的获得,人类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历史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要受到主体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它不是一个逻辑的前后相关的知识系统,而是一组物质的和认识的实践。各种不同的实践形式构

成了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讲,科学实践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只有将科学理性的分析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科学事业的“实践结构”,才能在系统地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

其三,语用分析和语境实践的趋同。作为对语义分析的超越,语用分析本质上是一个揭示语境本质的过程。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言说行为作为由此种语境进入别种语境的功能,它所表达的命题,将随着使用的语境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其所蕴含的具体特征的选择,同样是语言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背景选择,因为言说或言说的产物及对它们的解释是语言地、文化地和社会地相关的。而这种选择,只有通过语境的作用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只有从语境的实践性上去研究语用的形式、特征、本质和实现的途径,在语境的基底上去构建语用分析的方法论性,从而将语用的本体论性和方法论性结合起来,才是一个较有前途的研究趋向。这充分表明,一方面,在20世纪的语言哲学发展中,从对语形的经验语义分析到对语用的语境实践分析,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由语用个体论走向语用整体论的趋向。所以,语用分析的客观性及意义是以语境的实在性为前提的。在语境的基础上去谈论语用的意义及方法论趋向,是一种语用研究的本质要求。

当然,“后现代语言哲学”仅仅是“后现代性”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语言哲学绝非有某种有形的“标签”或形态,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着“后现代

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基点的重新定位。在这个意义上讲,对后现代语言哲学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从本质上讲,后现代语言哲学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倾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它仅仅是一种语言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我们提出“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语言哲学进步的时代特征,而不是其他。

无论如何,从后现代性与后现代语言哲学的现存性,后现代性特征与语言哲学的转向,后现代语言哲学的特征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及融合,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走向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战略和语境论的科学实践观等各个方面,去阐释后现代性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趋向”的本质,对于把握后现代性在语言哲学中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理解它的本质,在历史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语境中,促进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合流,由此把对语言哲学甚至科学哲学的研究全面地推向21世纪,均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冯契. 哲学大辞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1269.
- [2]郭贵春.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M].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5. 11.
- [3]郭贵春. 后现代科学哲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89.
- [4]郭贵春. 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1):31-32.

On the Postmodern Trend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YIN Jie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Key words: postmodernity;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bstract: Through narrating briefl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cent study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dissertation reveal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movement,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re appears the developing trend toward postmodernity. The paradigm shifting of reference, truth and mental intention theory show vividly the concret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endency to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r summarizing the developing and grasping the future tendency, this research has an important understanding function and inspiring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石涛)